



那些创造奇迹的双手

5年很长,长得足够让一粒新生的种子成长为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。

5年很短,短得不够刻画一个民族重整河山的惊心动魄与众志成城。

5年很快,快得让被自然毁坏的家园变身为生机勃勃的美丽新世界。

5年很慢,慢得足够让饱受创伤的信心在日升日落里静静沉淀生长。

春风又绿汶川。

5年长短快慢的变奏,谱写出一曲激扬深沉的时代乐章。人,顶天立地的人,是其中最动人的音符。

5年间,是修复是重生更是新生。

我们看见,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,顽强地从创伤中挺直腰板,自力更生坚忍不拔,用双手捧出希望绽放笑容;

我们看见,来自天南地北的援建者,伸出骨肉同胞温暖的双手,创造出速度与质量双赢的建设新局面;

我们看见,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客,用他们热切的双眼注视着,用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帮助和见证着汶川的变化。

就是这一双双手,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默默地改变着这片土地。

来到昔日的地震灾区,今天的人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双“艺术的手”。在艺术家的创作中,“手”是最有代表性的重生题材。在聚源中学,有一个“四手相连”的雕塑,表述着手手相握的温暖和力量;在汉旺镇中心广场,一座大手牵小手的雕塑被命名为“大爱永生”,记录着生命守望不离不弃的情怀;在青川县马鹿中学,有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雕塑,雕塑的基座上印着22个援建者的手印。在这里,手,意味着力量;手,展示着不屈;手,象征着希望;手,创造着奇迹。

让我们感谢这些创造奇迹的双手。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,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,重温他们不同寻常的5年。这是回忆,也是纪念,更让我们从一段特殊的经历中汲取力量、凝聚共识,更自信更积极地迎接未来的挑战。

同舟共济生生不息。在重建的洪流之中,哪里还需要分清本地人还是外来客?今天的汶川奇迹,来自13亿人用爱心、智慧和汗水的共同创造,来自今天的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。

无论富饶还是贫瘠,无论广阔还是狭小,无论创痛还是平安,祖国山河的每一寸土地,都是13亿人捧在手心里的珍宝,也都将是中国梦开花结果的地方。

文/姜 范



用心建家园

口述者: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党委书记 席增斌

当你考虑得更多的是工作时,就不会觉得累。基层干部真的在干事,在为老百姓着想。

汶川特大地震后,我先后担任北川县白什乡、禹里乡、曲山镇党委书记,这3个乡镇都是重灾乡,重建任务很重。

2008年5月12日那天,我正在成都开会。地震了,我马上往回赶。出成都的路堵得厉害,平时开车4个小时的路程,那天晚上快7点才赶回来。天已经黑了,县里派我到擂鼓镇查看灾情,随后又到任家坪转移伤亡群众。震后第三天,县里派我回白什乡,从北川到关里的路断了,关里12个乡镇成了孤岛。

进入大山,最怕找不到路,我们几个人结伴进去。聪明人说,沿着高压线走,不会晕山。那条路上,余震、飞石、塌方、泥石流不断,你知道吗,我们走了一天一夜,翻了7座大山!爬山时,手拽着石头往上爬,脚却往下溜。最危险的一次,就在我前面,余震造成塌方,“嘭”的一声,我们站在那里停了20分钟,硬着头皮跑过去。父母就我一个儿子,出门时,我是背着他们走的,不知道自己能否安全回来,翻第四座大山的时候,碰到认识的人,我请他给家里带信,就说我已经平安到达白什乡,省得他们担心。

在山上,我们住了一晚。第二天一早,我们往山上爬了20多米,发现一条两厘米宽的裂缝,如果昨夜山石垮塌,后果不堪设想。那天,整整又走了6个小时,我们终于到禹里乡了,这里路还通,能搭摩托车回白什乡。你看我头上是不是有个红星星?回想起来,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,那么大的灾,我连皮都没擦破,就是扭伤了脚,这还不是头上有颗红星星?

文/本报记者 王 晋

地震后,我在白什乡搞重建,修了3座桥,在全县农房重建进度第一。2010年6月28日,山东援建项目全部移交了,我正想歇口气,没想到又被调到禹里乡。

这个乡是重灾乡,关键是唐家山堰塞湖就悬在头顶,一直没有确定到底是原址重建还是搬迁。这是全省最后一个开始重建的,2009年6月,确定在海拔723米的位置上可重建,要求我们2010年12月必须完成重建。到任时,那里全是临时棚子和板房,路还没修通,桥也不能用,大量建筑材料运不进来。那时,一个月只能拉进来3000块砖,而我需要用30万块!我们马上分7大区域、6个小组,明确责任,加强保障,加速推进,建砖厂、弄沙厂,加班加点,当年就建了几十万平方米。我家修房子,我没时间去,群众修房子,我比他们还急。尤其是地方就那么大,要拆一些、挪出来,建好了再搬回去,有的房子先后拆了7次,群众不理解,每天有两三百人來找我“聊天”。他们哪有那么好心情“聊天”?其实就是提意见,闹情绪。没办法,我只能耐心细致地解释,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。

去年端午节头一天,我又接到赴曲山镇的命令。这边需要解决的遗留问题较多,我先调研了两个月,才作出工作部署。我们想了各种办法,化解基层矛盾。这5年,我的工作强度一直很大,说实话,靠的是责任心,当你考虑得更多的是工作时,就不觉得累。我真心想说一句,基层干部真的在干事,在为老百姓着想。

现在,我们正发展三七等养心菜,去年试种了300亩,每亩能增收6000元,今年争取干起来!说心里话,从我当乡长到今天七八年了,真心觉得对不起家人。如果有时间,我会用来陪陪孩子,这就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小小心愿。



无悔那三年

口述者:广东东莞援建映秀工作小组成员 陈志标

我们的测量队走过了映秀每一寸沟壑,用自己的脚一步步测完了地形。

援建映秀那3年,是我人生中最可宝贵的经历。我和援建工作组的组长陈林佐、同事傅晓炜全程参与了重建的每一阶段,从震后建板房到做规划、搞建设,一点一滴的变化都让我们刻骨铭心,当地人也亲切地称我们为“东莞三剑客”。

我们是2008年8月到映秀的。第一感觉是安静得可怕。人不少,可是听不到交流,看不到笑脸,我们连说话都不敢高声。

灾区群众还没从阴影中走出来。人心没有希望,重建就无从谈起,这是第一件让我们着急的事。我们想了一个办法,在震后第一个中秋节,策划了一场篝火晚会,邀请群众一起联欢,让群众自己出节目,并搞了“恢复重建有奖问答”,意在给他们一个蓝图、一些希望,让他们知道,未来几年我们都会在这里帮助他们重建家园。我的感觉,心理恢复就是从那个中秋节开始的。人们脸上开始有了笑意,有时也能看到群众在空地上唱歌跳舞了。

做规划是最艰辛的。记得汶川灾区13个乡镇第一次聚在成都讨论重建规划,我们拿着初稿去,主持会议的人却直接说,“映秀今天就不讨论了”。为什么?因为谁都心知肚明,映秀的规划没那么容易。作为强震的震中,重建映秀,要在0.74平方公里的狭窄空间避开强震断裂带,建齐各种功能设施,既要保证安全性,又要保证群众未来的生活、工作,同时,映秀作为震中背负了太多关注,大家共同的心愿是建成一个具有世界级水准的小镇。标准之高,也让我们“压力山大”。

刚开始是一头雾水。做规划总得有地图吧?可是没有,我们手上只有一张模糊的航拍图。我们的测量队走过了映秀每一寸沟壑,用自己的脚一步步测完了地形。为了达到高水准,我们遍

访众多国内外知名规划专家和建筑设计师。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小镇能汇聚那么多大师的心血,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何镜堂、巴黎卢浮宫扩建设计师贝聿铭等,仅参与的院士就有近10位。另一方面,我们还要走村入户访群众,充分听取灾区人民的意见。事实上,各方意见常常是有矛盾的,需要从中权衡利弊,找出较优方案。比如,专家认为应尽可能多地保留地震遗址,而当地人却不希望看到那么多遗址;又如,外界人会质疑映秀是否应搞旅游业,但当地人为生计考虑,却迫切希望发展旅游。因此,规划几易其稿,花费了整整10个月的心血。最后的规划,是要建成一个温馨舒适、有浓厚羌民族特色、有抗震博物馆的旅游名镇。为当地人的生计考虑,我们为每一栋民房都设计了铺位店面。那段时间,援建组在紧迫的时间表下,每天的工作像一场足球赛:白天是“上半场”,晚上是“下半场”,深夜还常有“加时赛”。很多同志都累瘦了,我也瘦了10公斤。

2010年8月,新映秀已具雏形。就在我们筹备完工仪式的时候,可怕的“大考”来了。一天凌晨,汶川遭遇暴雨突袭,山上数十万立方米泥石流拦腰堵塞岷江,凶猛的洪水改道涌进映秀新镇,冲淹了大片房屋设施。得到消息,我们心中的悲痛无法抑制,难道两年的辛苦就这样毁于一旦?记得受灾最严重的是映秀水厂,我急忙打电话给北京的设计单位,对方说“扛得住、没问题”,事实证明,经过浸泡和冲刷的新建筑,一栋也没有倒下,我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。

我们离开时,映秀已经变成一座风景如画的新生小镇,一如我们当初所设想的。映秀的旅游业也发展得如火如荼,很多居民把临街房子改作家庭旅馆。不久前,我打电话给映秀的朋友,请他们帮忙订个房,谁知朋友回答“房子满了,订不到,如果周末来,连停车的地方都没有”,我听了又是开心又是感慨。在映秀度过生命中那3年,我终生无悔。

文/本报记者 郑 杨



为汶川加油

口述者: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中心市场报道部副主任 王涛

四川人民积极乐观的心态告诉我们,没有理由不热爱生活。

汶川地震发生时,我刚结婚不久,但身为一名记者,我觉得有责任要去,经过3次主动请缨,终于在次日晚到达抗震救灾第一线。

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,我深入到受灾最严重的汶川、北川、都江堰、彭州、青川等县,采访报道灾区群众现场救援、医疗救治等情况。灾区条件很艰苦,每天睡三四个小时,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在采访伤员时,有一个7岁小女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她是重灾区绵竹汉旺镇小学一年级的学生,地震导致她颈椎骨折。采访时,她向我表达了很多愿望,她说她最想吃冰糕,想游泳,想回去上学……从这个女孩身上,我看到了四川人所拥有的积极乐观的精神。很可惜,后来与这个孩子失去了联系,5年过去了,按年纪,这孩子也该上初中了吧,真心希望她一切都好。

从四川灾区回来,组织上给了我很多荣誉,包括“全国抗震救灾报道先进个人”、“全国抗震救灾优秀记者”等等,但我内心觉得受之有愧。5年来,我几乎没同别人聊过这些经历,我有意避免接触和汶川地震相关的信息。当年在汶川地震时写的稿子,被我放在电脑很隐蔽的一个文件夹里。但同时,我却更加关注与四川相关的消息,每当听到四川人谈自己家乡发生的变化时,我心里也暖暖的。

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的时候,我再次来到汶川,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此前一年的汶川,来往的都是军车、救护车,

留下的是人们悲伤的泪水。而一年后,马路上经过的都是运输钢材、木材的工程车,曾经的废墟已消失不见,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忙碌着重建家园的景象。有一部分人已经住上了新房,而没住上新房子的人们也开始盘算着,做什么生意,他们已经重燃对生活的渴望。

最近两年来到汶川,我惊讶地发现,灾区建设重点已由当初的基础设施重建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。很多企业前来投资,许多大项目投产落户灾区,当地的经济建设搞得红红火火。有人说,如今灾区的基础设施建得比原来还要好,当地群众已经逐渐远离了汶川地震留下的阴影。

今年发生芦山地震后,无论中央还是地方,处理应急事件都更趋理性、有序。大家没有恐慌,而是各司其职,忙而不乱,在组织安排、救灾迅速程度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。我想,这也得益于汶川地震中获得的经验教训。

仔细算算,汶川地震之后,我曾经去过汶川10余次。我把当年穿过的迷彩服,背过的应急包,用过的雨披、帐篷都整理好,放在家中的柜子里,不是当纪念用,而是时刻提醒自己,作为职业记者,一有突发事件做到随时出发。之后的采访任务,我比以前准备得更充分,也更有信心和经验,来准确地找到大众最需要的东西。

同样,我也深切体会到家庭 and 亲情的不可替代,我开始学习如何照顾好家人,教会孩子更多的应急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。无论工作多忙,我都努力让家人团聚的时间更多一些。四川人民积极乐观的心态告诉我们,没有理由不热爱生活。

文/本报记者 韩秉志

本版编辑 梁 婧